

中国共产党 创始录

马连儒

中国社会出版社



74131/5106

中国共产党创始录

马连儒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创始录

马连儒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河沿147号 邮政编码100006

北京海淀华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 249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定价5.00元

ISBN 7-80088-059-1/D·13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陈独秀、李大钊的建党活动为主线，选取历史事件的关键情节和人物活动的重要事迹，详尽地记述了在他们的指导下，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筹备建党的经过，以及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的历程，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具体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的全过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唯一正确性。

全书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再现他们的时代特征、思想趋向、性格和精神风貌。

目 录

第一章 曙光初照神州	(1)
京津道上的一辆骡车.....	(1)
前进的路坎坷不平.....	(3)
跨过障碍便是坦途.....	(7)
与时俱进贵相知.....	(11)
冲入暴风雨.....	(20)
波澜突起呼声急.....	(29)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35)
“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41)
第二章 火种撒遍大地	(55)
地下的火在运行.....	(55)
初步的尝试.....	(70)
神秘的使者.....	(83)
红色的五月.....	(96)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10)
两颗引人注目的新星.....	(118)
第三章 点燃共产主义的火炬	(131)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131)
北京镌刻着建党的历史贡献.....	(147)

喜讯来自蒙达尼·····	(167)
湘江掀起新潮·····	(182)
武汉新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203)
黄河哺育的“拓荒者”·····	(215)
携带党纲到东瀛·····	(224)
羊城的春天·····	(229)

第四章 百川归海向太阳·····(242)

《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分化·····	(242)
罗素讲演引出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249)
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63)
一九二一年的五一节·····	(272)
加快在全国建党的步伐·····	(294)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305)
航道已经开通·····	(318)
纲领尚须制定·····	(340)

参考资料·····(347)

作者后记·····(253)

第一章 曙光初照神州

京津道上的一辆骡车

北京，1920年2月中旬，正值旧历年关，严冬酷寒。无边的黑暗笼罩着祖国的大地。

趁着黎明曦微，一辆带篷的骡车经过守门警卫的详细检查和盘问后，从朝阳门（齐化门）驶出。除赶车者外，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偏坐在外辕上，约模三十岁上下，质朴、持重，头戴瓜皮小帽，手持旱烟袋，穿一件灰布棉袍，脚上穿一双黑布棉鞋，完全是河北乡下人的装扮。他的肩上背着褡裢，上面插放着店家的帐簿，封皮上的红纸片子，十分引人注目。这个人操冀东北一带乡音，路上如遇盘查和沿途住店食宿，都由他出面应付处理，俨然是个帐房先生。另一个坐在车篷里，出城后才打开车帘，此人有四十岁左右，盘膝端坐，沉默寡言，俨然是个东家。他头戴毡帽，身着长袍马褂，上身套了一件油迹发亮的背心。

骡车越走越快，经通州，过廊房，直奔天津。

这是一辆很不平常的骡车，车上的“帐房”先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东家”模样的人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引自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陈独秀。这是李大钊第二次为陈独秀逃避北洋政府军警的追捕，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凭着自己的乡音熟路，在乔装打扮以后，护送陈独秀出北京转道天津赴上海的。在这次难忘的由京赴津的路上和暂住天津的时日里，两人详尽地讨论了在中

国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具体事宜。

李大钊化装成商店、货栈的掌柜模样，当时确是很难分辨真假的。1918年1月，鲁迅在《新青年》编辑部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李大钊时，就留下了这一深刻难忘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笔纸店的掌柜。”由这一掌柜的形象，鲁迅还讲述了一段难忘的故事：“1926年3月18日，段琪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那一次，他（指李大钊一引者注）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蛋！’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倘若这次他不象商店掌柜，那结果可能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天津后，李大钊住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的友人家中。为了安全，陈独秀被安排住在外国租界的客栈里。在津期间，陈、李二人由一位南开进步同学带领，与黄凌霜等人一起，拜访了住在特别一区的苏俄友人鲍立维（英文名字BYOWay），商量的筹备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的事宜。谁知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却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为防患于未然，李大钊立即护送陈独秀乘轮船离津赴沪。他自己也迅速搭火车返京。临行前，陈、李二人约定，各自在京沪两地筹备组织建党，这就是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佳话的由来。

五四时期流传的一首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李相约建党不是偶然的巧合，那是2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两人思想发展的结晶。

前进的道路坎坷不平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安庆人。李大钊，名耆年，字守常，河北省乐亭人。陈独秀较李大钊整整大10岁，生于1879年10月9日，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

陈独秀生于小户人家，长在书香门第。他两岁时，父亲病故，过继给叔父陈昔凡为嗣。陈昔凡是前清举人，官至东北辽阳、新民等地知县、知府。少年时代的陈独秀，是在祖父的严厉呵斥和凶狠手板下开始读书的，只有母亲同情他。他不止一次以沉默对抗祖父，即使被打得再疼，也听不到他的一声哭叫。这种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后来影响了他的一生。出于逆反心理，他对祖父一辈人摇头晃脑背诵四书、五经，从不感兴趣；母亲常在耳边劝他光宗耀祖的话，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大哥设身处地的好言开导，更是无济于事。1896年，陈独秀17岁时，为了敷衍好心的母亲，勉强通过县考、府考、院考，竟得了个金榜第一，算是中了秀才。陈独秀为了报答母亲，想考个举人回来，让母亲再高兴一次。但是，第二年的南京乡试，他却名落孙山。他并不感到意外，反而绝了母亲想让他通过科举向上爬的心愿，开辟了自己应该走的路。

陈独秀在参加院试的前一年（1895年），北京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康有为“公车上书”事件。考秀才这年（1896年），

梁启超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深受全国知识界的欢迎，这使孤居安庆之地的陈独秀顿开茅塞，“觉昨非而今是”。1897年，正当陈独秀赴南京乡试这一年，德国霸占了山东胶州湾，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也恃强凌弱，对中国实行瓜分豆剖。陈独秀是个有血性的青年，“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写下了他最早的一篇著作《扬子江形势论略》，激情澎湃，充溢着满腔爱国之情。但是他“总论全国大局”的“防内”、“御外”之策，并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连他所倾慕的康、梁“百日维新”，也于1898年遭到失败，戊戌“六君子”成了清王朝的刀下鬼。

路在何方？为寻求救国方略，中国青年开始飘洋过海，一批批涌入经过明治维新而一跃成为强国的日本。1901年11月，陈独秀也自费赴日，入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社，在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和不久又创刊的《国民报》上读到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的理论、学说，并从他们推崇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号召推翻封建王朝的宣传中得到启发，摆脱了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于是，他的思想长上了新的解放的翅膀。第二年春天，陈独秀迫不及待地回到安庆，发起组织藏书楼演说会，探讨中国“致弱之源”，对外“争强之道”。然而这些举动不为当局所容，同年9月，不得不重返东京，改入成城学校陆军科。这时励志社内部分化，陈独秀退出该社，另组青年会。清政府为了压制留日青年的反清革命运动，派留学生姚煜暗中监督破坏。1903年3月，姚作奸犯科。一群青年借机深夜闯入

姚的屋内教训他，姚连连求饶。但大家不容分说，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演出了现代史上一幕“割发代首”的喜剧。此事引起清政府对日的严重交涉，陈独秀等被迫回国。

陈独秀回到上海，正值国内拒俄运动方兴未艾，他立即返回安徽，组织和发动安庆的拒俄运动。他逐条揭露俄国所提出的“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六项无理要求。斗争实践使他逐渐认识到拒俄必须反清，爱国必须革命的道理。1903年上半年，陈独秀的名字被安徽巡抚排在指名通缉的名单之列。他不得不逃往上海，协助章士钊开办《国民日报》，大声疾呼民族民主革命，强烈要求结束历史上“三千年黑暗”，欢呼“联邦新制度”降临神州大地。但是，《国民日报》办了不到四个月，就被“严禁售阅”。此后陈独秀继续译完了好友苏曼殊没有译完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从第七回起，加进了苏曼殊、陈独秀编撰的由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引发的故事，人物的名字采谐音手法，诸如男德（难得）、明白（明白）、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州苟（满州狗）等等。而主人公“男德”的话语则更是苏、陈二人的内心自白了。如：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这种大胆蔑视孔儒礼教的话，与后来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言论可谓是一脉相承的了。

1904年年初，陈独秀返回安徽，在芜湖与友人合办《安徽俗话报》，共出版了22期，先后发表文章50多篇，以浅近通俗的文字，继续致力于开发民智，鼓吹反帝爱国宣传。此时在国内和日本的一批激进的革命志士，愤世疾俗，策划以

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东京留日学生相继组织了暗杀团，伺机刺杀慈禧；黄兴组织了兴华会，也想在慈禧举办万寿节之时，发动长沙起义，许多名人，如章士钊、蔡元培、蔡锷等都参加了。同年11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约，再赴上海，参加了爱国协会，习功练武，试验炸药，准备起事，后因机密洩漏，故未获成功，参加者或被捕、或逃散。陈独秀再度返回安徽，继续密谋策划好友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载泽、载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因吴樾经验不足，在火车旅客拥挤中，加上车身的震动，导致怀揣的炸弹自动引爆，当场牺牲。此次暗杀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陈独秀对好友“碎身直蹈虎狼秦”的壮举十分赞佩。为继承烈士的遗志，1905年，陈独秀回芜湖与柏文蔚一起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被推举为会长。1908年，岳王会在总指挥熊成基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经三昼夜的浴血奋战，最后失败。熊成基被捕杀，岳王会中的主要骨干都英勇就义，全省受株连被杀者约三百余人。

在以往几种形式的革命屡遭失败、战友惨遭杀戮面前，从1906年到1911年9月，陈独秀变得沉默寡言，没有再参加什么大的政治活动，政论文章发表的也很少，从保存下来的少量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湘娥鼓瑟灵均恹，才子佳人共一魂”；“坎坷复踟蹰，慷慨怀汨罗”；“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成廓，犹自绝追攀”；“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苦闷中露出孤傲的彷徨，忧愤中显出追攀的希望，他内心燃烧的革命之火并没有熄灭。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枪声，鼓舞和推动着他重新登上革命舞台。这时，他发表了讨伐清王朝的战斗檄文，出任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第二年袁世凯

篡权，刺杀宋教仁，免去柏文蔚皖督之职，另任孙多森。陈独秀闻此提前留下辞呈，以“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隐语，直刺封建专制的复辟阴谋。在“二次革命”中，柏文蔚复任皖督，其部下龚某残杀无度，又将讨袁计划密告段祺瑞。陈独秀、柏文蔚直斥龚某。龚某反目，将其二人捆绑起来，准备枪决。幸有一旅长率部赶到，才幸免一死。“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新任皖督上台，把陈独秀列为通缉的第一名要犯，他再次潜逃上海。1914年7月亡命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当时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上面爬满虱子。就在这一年，陈独秀结识了李大钊。“同是天涯论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跨过障碍便是坦途

李大钊的家境，在当地来说，还算较为富裕人家。他父母早亡，是靠祖父母疼爱教养大的，11岁时完婚。李大钊早年读过私塾，在参加科举考试中，正巧颁布了废除科举的命令。他未读完中学，1907年就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踏上了研究政治的路，从而决定了他的一生。这期间，国势日危，外人凌辱，促使他发愤献身救国事业。他决定改名“耆年”为“大钊”，改字“寿昌”为“守常”，意即不求生命之恒久，只愿坚持原则，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终身。辛亥革命曾使他振奋过，然而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他痛心疾首。1912年，他参与组织发起北洋法政学会，创办《言志》杂志，还加入了北京的中国社会党。1913年4月，他在《大哀篇》中，尖锐地抨击了当时所谓的共和政体，指出“民政”、“民权”“幸福”，与黎民百姓无缘，完全变成了少数豪暴

狡狴者的“专政”、“窃权”和“幸福”。在共和政体之下，“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可贵之处是，这时李大钊已经把骗人的假共和政体与人民深广久远的痛苦紧紧连在一起。。在李大钊看来，只有实现真共和，人民才能得到真幸福。同年夏天，他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到北京主编《法言报》。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党领袖陈翼龙被枪杀，使李大钊陷入了苦闷。但他毫无厌世之想，在《文豪》一文中，他发出了“以全副血泪”，“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的呐喊。

为了补充自己学识的不足，寻找新的“救人救世”良方，1914年春，李大钊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他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在章士钊所办《甲寅》上发表《国情》等文章，批驳外国侵略者“褊塞阴狠”之论，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共和。此间，陈独秀以文会友，与李大钊结为友好。1915年留日学生总会成立，第二年李大钊出任该会文牍干事，并主编《民彝》杂志，起草通电，反对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他在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中指出，当祖国危亡之际，政府“无权以命我国民屈服于敌”，号召人民奋起自救，他相信“苟我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之前”。当袁世凯正式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之后，李大钊编辑了《国耻纪念录》，指出对于中国这无疑是“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

这时期，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的是，他对于人民群众

改造国家的直接行动抱有强烈的希望：“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首次以“独秀”署名，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从“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的中心立论出发，对中国人与欧美人关于国家的两种态度作了分析，他认为：“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假如不懂得这个道理，结果只能是“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甚至“爱国适以误国”。对于自觉心，陈独秀则认为，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有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略他人之自由而战者”，这显然不是爱国主义，乃为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中国人却不然，是“不知国家情势而爱之者”。中国人当时所爱之国是外有列强瓜分，内里法日废、吏日贫、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这样的国家，即使改朝换代，也会依然如故，“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陈独秀还进一步认为“今我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进而他推论道：“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甚至说，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亡国为奴。何事可怖”。

这篇文章发表后，诘问叱责者甚多，有人骂陈独秀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1915年8月李大钊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专门对陈文提出了批评。文章首先肯定在历次革

命失败后普遍滋长起来的厌世情绪是爱国心的一种曲折反映，如历史上屈原怀沙自沉、老子骑牛而逝一样，可谓推心置腹之论。其次引出一位友人读陈文的感想，开始是“伤感过甚”，但目睹国内专制残民的大量事实以后，该人反“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之”。李大钊认为：独秀君之文“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陈文的主要弱点。在李大钊看来，当务之急应在于扫除厌世之雾，开放自觉之心。而“自觉之心，即在改造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甚至“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对于陈文所说的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的观点，李大钊不以为然，他说，难道使“韩并于日，土裂于人，墨联于美”真的值得夸耀为各得其所吗？如果那样，中国只有“坐以待亡，听人宰割，附俄从日，惟强者之命是听”，“斯而可乐，人间更有何事足为畏怖？”到那时，绝不会有任何幸福加于“国家尚存残体”，只有自甘居亡国奴的地位而已。李大钊在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位文人漫游巴黎的印象：“目击穷苦细民，杂处蓬窰，褴褛曝日，风飘蔽隔，泥沟流秽，臭气逼人”，从侧面说明西方国家也不是为所有人“共谋幸福”的。文中以朝鲜、印度亡为英、日两国殖民地的现实为例，提醒人们注意，不能“异日者天涯沦落，同作亡民”。文中极深刻地写道：“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惟奋起精诚之所至以求之”。

李大钊在文章中提出了“自觉之义”在于“先觉者”“改造立国之精神”。但什么是立国之精神呢？文章没有来

得及回答，但不久之后就作了回答。我们只须仔细阅读陈独秀的原文，却可以寻找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即“立国之精神”在于民权。民权高于一切，其价值高于国家。此时的陈独秀对代表国家的腐朽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已把过去大声疾呼的“国亡家破”口号置于脑后，而把改变中国民众普遍缺乏民主觉悟，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看作为当务之急，认为这正是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和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失败的关键所在。“先觉者”没有这种觉悟，又怎么能认识到唤醒民众的民主觉悟呢？这恰恰就是不久以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真正原因。

与时俱进贵相知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经过多方筹措，9月出版了由他主撰的《青年杂志》，（1916年3月），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伟大旗手。《敬告青年》是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的创刊宣言，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它热情讴歌青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号召青年“奋起智能”，力排“陈腐朽败”，鲜明地提出了“敢于自觉于奋斗之青年”的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声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即民主——引者注）并重。”他认为，在科学和民主面前，“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